

# 出土文献与古书的反思

梁涛 白立超 编

出土文献与思想史研究丛书

主 编：纪宝成

执行主编：黄朴民 梁涛

案、反间的方士常  
正有同样的感觉。  
个系统也是可能而  
当依着现在的历史  
看的材料，要考工

此其二：以前学者提出的问题，哪些是已解决的，哪些是待解决的，哪些是不能解决的，应当审查一下，结一清账，此其三：现在应当提出的新问题是什么，这些新问题应当怎样去解决，应当计算一下，此其四：新材料和新问题的整理已经够许人的忙了，何况加以新材料和新问题的出现，更哪里是少数人的力量所能包办的！至少的限度，必须对于旧的有了过半数的认识，对于新的有了大体的预测，才可勉强搭起一座架来，称之为假说的系统。这件事，现在能做吗？数年以来，一般

不耐没有系统，但也不耐整理，很大力去搜集材料和推论问题，于是只在传统的文献里兜圈子，真的不足，把伪的续，只要那书的人拿上了一份自己想象中的衣服，就自以为找到新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出土文献与古书的反思

梁涛 白立超 编

着的材料，要考古学家

此其二。以前学者提出

决的，哪些是不能解决

现在应当提出的新问题

着的材料，要考古学家

此其二。以前学者提出

决的，哪些是不能解决

现在应当提出的新问题

着的材料，要考古学家

此其二。以前学者提出

决的，哪些是不能解决

现在应当提出的新问题

着的材料，要考古学家

此其二。以前学者提出

决的，哪些是不能解决

现在应当提出的新问题

着的材料，要考古学家

望而不可即。我们对于古史，

但比较完备的时候，要找得一

计是什么？许多现存材料，因

去整理一过，此其一。许多缺

山他们的手里给了我们，许多缺

决的，哪些是不能解决的，哪些是待解

决的，哪些是不能解决的，哪些是待解

决的，哪些是不能解决的，哪些是待解

决的，哪些是不能解决的，哪些是待解

决的，哪些是不能解决的，哪些是待解

决的，哪些是不能解决的，哪些是待解

决的，哪些是不能解决的，哪些是待解

决的，哪些是不能解决的，哪些是待解

决的，哪些是不能解决的，哪些是待解

决的，哪些是不能解决的，哪些是待解

决的，哪些是不能解决的，哪些是待解

决的，哪些是不能解决的，哪些是待解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土文献与古书的反思/梁涛,白立超 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2. 10  
(出土文献与思想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5407-5886-8

I. ①出… II. ①梁… ②白… III. ①古籍—辨伪—中国—文集 IV. ①G256.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4948 号

组 稿:张玉琴

责任编辑:王红军

封面设计:李星星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690mm 1/16

印张:23 字数:340 千字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55.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888)

# 在“机遇与挑战：思想史视野下的出土文献研究” 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致辞

——《出土文献与思想史研究丛书》代序

纪宝成

各位专家、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人民大学，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向出席“机遇与挑战：思想史视野下的出土文献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同学致以亲切问候和热烈欢迎，对多年来一直关心和支持人大国学院事业的各位朋友表示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

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就曾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而五十年后大量的出土发现，再次证明王国维先生当年的精辟论断。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睡虎地秦简、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的出土，掀起了出土文献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其中银雀山汉简《孙臧兵法》的发现，解决了长期争论不休的《齐孙子》与《吴孙子》的问题，而马王堆帛书《五行篇》的发现则揭开了聚讼千年的思孟“五行”之谜，而《黄老帛书》、帛书《周易》、《易传》、帛书《老子》等文献的发现，同样大大推动了古代思想史的研究。这些文献是如此珍贵和重要，以至于有学者称，它们的发现可视为开辟了一个学术研究中的“马王堆的时代”。

到了上个世纪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建设的蒸蒸日上，或因为工程建设的需要，或因为贪欲刺激下的罪恶盗掘，一批批深埋于地下两千多年的先秦竹书，纷纷重见天日，呈现于我们眼前。其中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郭店楚简的问世，掀起了简帛研究又一个高潮，郭店竹简中不仅有目前所见最早的《老子》版本，以及《太一生水》这样珍贵的道家文献，同时还发现《五行》、《缁衣》、《鲁

穆公问子思》等子思佚籍,使我们有可能揭开思孟学派的神秘面纱,补上“孔孟之间”的空白,其学术价值难以用语言简单估量。故有学者称,出土文献研究,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郭店时代”。

郭店竹简之后,又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岳麓书院藏战国秦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相继公布和介绍。这些新发现的文献,有些可以与传世文献相对读,有些则完全是消失了两千多年的珍贵佚文。它们的失而复得,不仅给学者们带来极大的激动与振奋,也使我们有可能直接触摸到古人的真实心灵,认识到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远比已知的要丰富、复杂。需要说明的是,王国维先生在上个世纪所能看到的出土资料,主要是甲骨、金文,以及西域沙海中的汉晋木简等,而对于直接书写在竹简、帛书之上,记载古代思想、学说、文化的文献,则是完全没有见到的。至于这些新发现的竹简数量如此之多,其记载、反映的内容如此之丰富,恐怕是王国维先生想也没有想到的。王国维先生没有想到的,今天却成为了事实,故今日之时代才可谓之“发见(现)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王国维语)。与王国维那一代学者相比,今天从事出土文献与古代思想学说研究的学者,可谓是生逢其时,是真正的幸运儿。

然而正如本次会议的主题所言,大量出土文献的发现,在给我们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提出新的挑战。出土文献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涉及哲学、历史、文学、经学、子学、文字、文献学等多个学科。一般而言,可分为古文字研究、文献学研究和思想史或哲学史研究三个序列。其中文字、文献的研究是基础,而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是最终目的。由于近些年发现的郭店简、上博简等新资料多是思想性文献,故在第一序、第二序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延伸到第三序,从古文字、古文献的层面上升到思想史、哲学史的层面;如何通过简帛研究的新发现挑战原有思想史研究的思路和预设,如何通过思想史研究反思简帛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促进思想史研究的反思及精进,便成为下一阶段的重要课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庞朴、李学勤、杜维明等先生提出了“重写思想史”的主张,得到学术界的响应。但也有不同意见,甚至有学者表示质疑和反对。我们认为,学术研究贵在创新,所谓研究就是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深化、补充、推进、完善,甚至推倒旧说,创立新见。陈陈相因,照本宣科,虽然是知识传播的必要手段,却是学术研究的大忌。从这一点看,“重写思想史”每天都在发生和进行,一个真正优秀的学者就应不断超越前人,开拓创新,而不应墨守成规,抱残守缺。只不过近些年大量出土文献的发现,为“重写思想史”,为思想史研究的开拓、创

新,提供了重要的机遇而已。当然,“重写思想史”并不是否定前人的研究成果和贡献,也不是为了片面夸大出土文献,忽视乃至贬低传世文献。相反,只有充分重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以“二重证据法”为指导,引进新的研究方法和理念,才会有新的创见、新的发现、新的建构,才会大大提升和推进已有的思想史研究水平。这种深化与进展,显然就是在重写思想史。

这次出土文献盛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召开,既是机缘巧合,也带有某种必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自2005年成立起,始终坚持“大国学”、“新国学”的理念,筚路蓝缕、脚踏实地、勇于创新、锐意进取,开展全方位的工作,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受到社会各界、上级部门和国家领导的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提倡的“大国学”的“大”是指“有容乃大”的“大”,而不是“大而全”的“大”。它包括三义:一、从知识形态来看,“大”是强调我们不仅关注和研究古代华夏、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关注和研究其他少数民族,包括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而现在已经消失了的民族所创造的文化。这里的“大”是包容的大。二、从研究方法来看,“大”是突出我们主张打破学科壁垒,贯通文史哲,培养通才型的学术人才。这里的“大”是贯通的大。三、从价值观念来看,“大”是说明我们对传统文化不是采取简单鄙夷、菲薄的心态,而是抱一份温情与敬意,以一种弘扬的态度,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格局下,通过创新性的总结与研究,将中华文化之美展现给国人,展现给世界。这里的“大”是光大的大。

有学者以设立国学是重复建设,甚至以对现有文史哲学科体系形成了冲击为理由,来质疑国学的合理性,实在是杞人忧天,不值一驳。我们知道,民国时期,学术界一方面大规模学习、引进西方学科体制,建立了中国哲学、考古学、民俗学等新学科,史学、文学等学科也大量运用了西方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又将这些新建立的学科归于国学之下。这样,国学就是一个学科门类,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于是随着文史哲等学科的建立和完善,国学也就逐渐解体,让位给以文史哲为主的现代学科体系。但我们今天所谓的国学,不同于民国时期的国学,它不是一个学科门类,而是一门具体的学科,是学科之学,而不是门类之学。其地位类似西方的古典学,主要是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传统文化中无法在现有学科体制中容身的内容,如经学、子学、文史之学等,做一种整体性的研究。它对于文史哲等学科而言,不是一种重复建设,更不是一种冲击和挑战,而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和完善。同样,出土文献也是一门新兴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在现有学科体制下,很难确定其身份和位置。若将其放在国学之下,作为中国古典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无疑是十分合理的。而国学院贯通文史哲,重视文字、文献、思想义理的教学方法,更有可能培养出优秀的出土文献研究人才。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学热衷,胡适先生曾提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主张,但由于其“全盘西化”的片面认识,始终无法处理好“整理国故”与“再造文明”的关系,无法将古代文化转化为“再造文明”的丰富资源。今天我们不能再做那种“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的事情,而应以开阔的心胸、创新的态度面对自己的传统,面对自己的文化。在今天,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主张是:“挖掘古典,返本开新;融汇中西,再造文明。”

杜维明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如果考古挖掘突然发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遗稿、残卷,那一定会大大震惊整个西方学术界,并有可能引发一场新的文艺复兴运动。饶宗颐先生也期望郭店竹简等文献的发现,会带来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确,近些年的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大量“重建文明”的有益资源,如郭店竹简“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的批判精神,“利天下而弗利”的禅让贤者而不是子女的制度设计,以及重视身教,以身作则的领导方法,等等。对出土文献中这些新发现的观念、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理论阐发,一定会大大改变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树立起我们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作为我们国家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与研究的最重要基地之一的中国人民大学,在这方面当然不仅不应缺席,而且理当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作出令人瞩目的重大贡献。

我相信在后面的会议中,围绕这些问题,各位学者代表一定会有精彩的议论和高见,一定会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

最后,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 “二重证据法”与古书的反思(序)

梁涛 白立超

### 一

学术界认为,现代学术史上有两次对于古书的集中反思。一次是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疑古派,其特点是以书本论书本,主旨是对古书的怀疑;另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李学勤先生为代表的“走出疑古”派,其特点是注重二重证据法,注重地下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结合。因李学勤先生非常重视冯友兰“释古”之说,故也可约定俗成称之为释古派。其实,不论疑古派还是释古派,其对古书的反思都与出土文献有一定联系,例如疑古派健将顾颉刚就曾指出,“古物出土愈多,时常透露一点古代文化的真相,反映出书籍中所写的幻想,更使人对于古书增高不信任的意念”<sup>①</sup>。可见,顾氏的疑古也有其“二重证据”,只不过是更多强调了“疑”的一面。他们利用甲骨、金文的研究成果,试图为自己的理论寻找依据。随着“古史辨”逐渐走向“古书辨”,“古史辨”派学者对古书进行了系统的辨伪工作,出现了大量的辨伪成果,如顾颉刚所编的《古史辨》四至六册,张心澂所著的《伪书通考》等,他们在继承传统辨伪思想和成果的基础上,将古书辨伪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一时间几乎无书不伪,无书不可疑。

相比较而言,王国维虽然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利用地下的卜辞材料写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这样的名篇。但由于受当时地下出土材料的限制,其主要限于对古书、古史中某一点的证明,其工作也主要是“古史新证”,而非“古书新证”,尚没有对古书做出系统反思。虽然有学者对“古史辨”的研究方法有所反省,对其结论有所质疑——中国真有那么多的伪书吗?中国古书真是“无书不伪”吗?并且取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

<sup>①</sup>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3—94页。



(如下文提到的余嘉锡所著《古书通例》一书),但在没有更多新出土材料的情况下,这些成果似仍难以冲破疑古之风的影响,没有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和肯定,故当时真正有影响的仍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

幸运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相继出土的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郭店简、上博简,直到现在正在逐步公布的清华简等,为我们再次反思古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些出土简帛在年代上,大多属战国到汉代早期;在形式上,多属于古代书籍,保持了古书的原貌;在内容上,多属于学术思想史的范围,其价值不容忽视,对于研究古书体例而言,更是弥足珍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李学勤先生提出了“对古书的反思”的主张。

## 二

然而,正如上一次对古书的反思一样,同样是面对出土文献,释古派与疑古派却有着不同的立场和理解:释古派学者往往利用出土文献揭示、说明古书成书的特殊性及其复杂的流传过程,以批驳疑古派缺乏对古书的了解,疑古过勇。疑古派学者则利用出土文献所显示的古书在流传过程中存在后人的删节、增添甚至篡改等情况,来为疑古辩护,认为这恰恰证明了顾氏的“层累说”。分歧并未消除,争论依然存在。如李学勤先生提出:

辨伪有时会过了头,每每是由于对古书的形成传流没有足够的理解。在印刷术发明以前,我国的书都是用简帛抄写甚至依靠口传的,经过若干世代的流传,编次的变化,文句的更改,后世词语的掺入,都是可能的,或者是不可避免的。不能由于发现了这一类现象,就斥为伪书。<sup>①</sup>

但同样是面对古书的流变现象,疑古派学者则针锋相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熟悉《古史辨》的人应该记得,古书在形成和传流过程中其载体及所载信息发生的种种变化正是“层累说”成立的前提,也是“疑古派”对

---

<sup>①</sup> 李学勤:《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古书、古史的真实程度发生怀疑的根据……李先生既然发现了古书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发生的种种流变现象,甚至还以实例证明有些经过后人“修改”的古书“不只是文字内容加多,而是在观点上有了根本性的变化”,那就应该承认,起码在穷其“流变”这一点上,他与“疑古”的“层累说”之间并非隔若鸿沟……面对共同认可的古书流变现象,“疑古”的顾颉刚“存疑”之后继之以“订疑”,方法是“立体地、一层一层地分析史料的形成时代。然后通过这种分析而确定每一层文献的历史涵义”……与此相反,“走出疑古”正是抓住古书的形成和传流过程这一点来祛除对古书的怀疑,平反古书冤狱。<sup>①</sup>

这一分歧的背后,实际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出土文献是否证明古书是不断层累、叠加构成的?与之相关,顾颉刚等人是否主张古书一般都是层累形成的,并从层累的角度考察古书的形成?二是如何看待古书的成书与其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删节、改造、添加现象?是否应对二者做一区分?前者指古书的形成,后者指古书在流传过程局部的失真或变化——在印刷术出现前,这是古书流传中较为普遍的现象——这样是否可以澄清或减少彼此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

关于第一个问题,说古书一般或多数都是由不同时期的人“层累地”完成的,显然缺乏根据。地下的出土文献往往也不支持层累说,以《老子》为例,虽然从郭店竹简本《老子》到马王堆帛书本《老子》字数、内容有所增加,但由于竹简《老子》甲本和丙本64章的重复,说明竹简本更有可能是一个摘抄本,而非最早的完整本。《老子》并非是出于不同时期的不同作者之手,而更有可能是某一时期作者的创作。再以简帛《五行》为例,竹简《五行》有“经”无“说”,帛书《五行》加了“说”的部分,似乎是一种层累,但“说”乃是后人对“经”的解说、发挥,其本身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不必与“经”混为一谈。相反,竹简本与帛书本《五行》经文内容基本相同,恰恰说明就《五行》的经文而言,并非不同时期的层累,而是某一时期的创作。近年的出土文献中经常有书籍的单篇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古人往往“因事为文”,“随时所作,即以行世”,“迨及暮年或其身后,乃聚而编次之”,其著作类似后世之文集,余嘉锡《古书通例》论之甚详,这显然与一般的层累说也有所不同。

---

<sup>①</sup> 杨春梅:《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文史哲》2006年第2期。其讨论古书部分,已收入本书。

其次,就顾颉刚而言,虽然有“不立一真,唯穷流变”之说,但是另有所指,并不能反映顾氏对古书的理解。真正反映顾氏思想的应该是伪造说,所以顾颉刚主要是从后人伪造而不是层累来看待古书的形成的。所谓顾氏“立体地、一层一层地分析史料”<sup>①</sup>,乃是指对不同时期文献、史料的内涵做流变性的历史考察,进而确定某一文献在这一流变序列中的大致位置及形成时代,如要考证《尚书·尧典》的年代,便对《尧典》的主要内容禅让做一番历史性考察,通过对《论语》、《孟子》、《荀子》以及《墨子》等文献的对比,梳理出孔孟荀等人对禅让态度的变化,进而推论《尧典》记述尧舜禅让的内容晚出,是受了墨家的影响。<sup>②</sup>由此可见,所谓顾颉刚“立体地、一层一层地分析史料”的方法,与近年出土文献中出现的编辑增加、文本改善、后人解说,以及有意的删改等情况,根本不是一回事。相反,由于顾先生并不了解古书在传播中所存在的流变现象——这并非顾颉刚本人的局限,而是那个时代的局限——往往根据古书的某些“晚出”特征,以判定古书的时代。因此,在考订古书的年代时,存在着较为普遍的“向后拉”的倾向。顾颉刚等人之所以在古书辨伪中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这可以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在反思古史辨派对古书的反思时,应敢于正视其方法上的局限与不足,而不必刻意掩饰,甚至是曲解其说,否则一味意气之争,又如何能推动学术研究健康、良性的发展呢?

### 三

既然古书并非层累地构成的,但在其流传过程中往往又经历了歪曲或变化,那么就应该对古书的形成与流传做一区分,以避免不必要的分歧和争议,李学勤先生强调不要“以静止的眼光看古书”,又说“对古书形成和传流过程的新认识,使我们知道,大多数我国古代典籍是很难用‘真’、‘伪’二字来判断的”<sup>③</sup>,恐怕就应从这一点去理解。因此,我们所谓的古书实际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它有一个大致确定的成书年代,另一方面又经过了后人的改动和增删。

---

① 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载陈其泰、张京华主编:《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16页。

② 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66页。

③ 李学勤:《李学勤集》,第42—46页。

我们考察古书,也应从这两方面入手,既考订古书的成书年代,也考察其流传过程中的变形与失真。对于前者,古人的记载是一个重要信息,应充分重视,只要不存在明显的矛盾抵牾之处,就不应轻易否定;只要某种程度上能得到地下文献的证明,就应该认为是可信的。故李学勤先生认为:

我们不能企望古籍记述的所有事迹一一取得地下的证据。能够保存到今天的文物,终究只能反映古代的一小部分。对于一种文献来说,如果其中某些关键的因素得到证明,或者许多要点反复经过印证,就应该相信这种文献整体大概是可信的。<sup>①</sup>

然而同样是面对这一问题,疑古派学者又一次针锋相对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注:指李学勤)觉得考古所不能全部证明的文献,应该由那些被“一小部分”文物证明了的“关键要素”和“要点”来确定其“整体大概是可信的”。但所谓“关键要素”和“要点”的标准是什么呢?如何确定文献中哪些是“关键要素”和“要点”,哪些不是?古文字的特点李先生比谁都了解,有时一字之差,甚至句读不同,对某句、某段、某篇,甚至某部书而言,都是至关重要之点,更不必说整句、整段、整篇的“变化”、“更改”和“孱入”。所有这些,岂能因为含糊难言的“关键要素”和“要点”的证明,就“相信”其“整体大概是可信的”?<sup>②</sup>

其实,只要明确了古书的成书与流传的区分,这种分歧和质疑就可迎刃而解。李先生讲的是古书的成书,而判断古书成书的重要依据是古人的记载,只要这些记载部分得到证明就应该是可信的。古史辨学者在考订古书时,往往轻视、怀疑古人的相关记载,更多地是从分析文本出发,提倡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实践证明不仅不够科学,反而容易制造出冤假错案来,主要是因为不了解古书的流变情况。因此,在考订古书的成书时,恐怕应该转换思路,由证明方举证转为由证伪方举证,对于古书的相关记载,只要没有证据证伪就不可简单否定,诚如王国维先生所言:“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

---

① 李学勤:《李学勤集》,第24页。

② 杨春梅:《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文史哲》2006年第2期。

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sup>①</sup>

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不是从古书的形成而是从古书的流传来看的话,上述质疑仍有部分合理之处。毕竟,古书经过了一个形成、流传的复杂构成,不能仅仅停留在一句“是很难用‘真’、‘伪’二字来判断的”上,我们今天考订古书,既要从“源”上说明古书的形成与年代,更要从“流”上考察其演变甚或篡改。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答案很简单:二重证据法。当年王国维先生在提出“二重证据法”时曾指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sup>②</sup>所谓“补正”,据王国维的解释,即补充、纠正,故二重证据法不仅可以用来证明,也可以用来辨伪,只不过由于所见地下材料的局限,王国维在使用二重证据法时,主要限于证明,而对于纠正则基本没有涉及,故往往使人们忘记了二重证据法还有辨伪的一面。今天大量地下材料的出土,使我们有条件利用二重证据法去考古古书的成书,同时也有可能去考察、说明古书在流传中的失真和变形。近年的出土文献研究中,不乏这样的例子,例如,《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四)》中有《内礼》一篇,其内容多与《大戴礼记》中的《曾子立孝》等篇有关,故学者往往利用二重证据法,证明《大戴礼记》的“曾子”十篇是可靠的先秦典籍。但将《内礼》与《曾子立孝》等篇相比,又可以发现二者文字上存在着差别,主要是后者略去了“故为人君者……”、“故为人父者……”、“故为人兄者……”等内容,将竹简中君臣、父子、兄弟间双向的、相互对待的“爱”和义务关系,转变为臣、子、弟对君、父、兄片面的职责,“颇有‘为尊者讳’的意涵”。说明《曾子立孝》在流传中曾被删改,而删改的原因可能与后来儒家君臣父子关系被绝对化,竹简要求君臣父子互“爱”、互“礼”的观点显得大逆不道、难以被接受有关。<sup>③</sup>

再例如,郭店《老子》的出土,使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疑古派学者关于《老子》“晚出”的推测可能并不成立。而竹简本与通行本一些重要文句的差异,则使人们了解到《老子》文本的具体流变过程,如通行本第十九章的“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竹简本作“绝为弃虑,民复季子”,就透露出早期道家与儒家并没有后来所想象得那么对立或水火不容的“重大信息”。刘笑敢教授则通过考察五种地下和传世《老子》文本,发现其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存在着语言趋同和思想

①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② 同上,第2—3页。

③ 参见拙文:《仁与孝——思孟学派的一个诠释向度》,《儒林》2005年第1辑。

聚焦的现象,对《老子》文本的流变做了深入、具体的探讨和说明。

因此,对于“关键要素”和“整体大概可信”的质疑,还是应明确问题,转换思路,从“源”、“流”而不是静止的眼光去看古书的形成和演变,要做到这一点仍离不开二重证据法。以往学者在谈到二重证据法时总是将其与疑古对立起来,疑古学者往往也有意回避或质疑二重证据法的作用,均不可取。我们今天所要做的,恰恰是要将二重证据法发展为疑古、释古两派都能接受的方法,既是证明的方法,也是“穷其流变”和辨伪的方法。当今学术界仍需要一个健康、有活力的疑古学派,疑古派学者应该与时俱进,海纳百川,积极吸收释古派的最新成果,调整扬弃以往的研究范式,将二重证据法纳入自己的学说体系中,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存疑、辨伪,“唯穷流变”的功能和作用。疑古与释古派学者应寻找彼此的共识,而不是陷入情绪化的意气之争。

#### 四

在拥有新的出土材料的条件下,首先应该对古书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具体讲,就是要借助简帛古书的研究,对古书有一个新的结构性的认识,对古书的体例和演变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这是我们反思古书的前提,也是疑古、释古两派寻求共识的基础。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余嘉锡先生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工作。针对疑古学派的辨伪书的理论,余嘉锡著《古书通例》一书,依靠传统目录学,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利用传世文献的信息,对汉魏以前古书通例进行了一些归纳,提出了“诸史经籍志皆有不著录之书”、“古书不题撰人”、“古书单篇别行之例”、“古书不皆手著”等观点。由于疑古思潮的影响,余先生的观点虽未引起较大的学术影响,但随着简帛古书的大量发现,学者愈来愈重视这部小书的价值所在,李零称赞“余先生读书多广,善于提炼,能由博返约,直探古人心曲,故验之以出土文献,若合符契”<sup>①</sup>。更有美国学者顾史考,利用新近出土的简帛古书对《古书通例》所列的条目逐一进行验证,发现竟能得到充分的证明。我们今天拥有比余嘉锡先生更好的学术条件,尤其是接触到更多的简帛古书,自然应该在《古书通例》的基础上,通过更为深入的研究,更多地了解古书的通例和演变情况,对古书有更为全面的结构性认识。这样,才能真正跳出“疑古”、“信古”的魔咒,通过古书的反思,为中国古史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提供一个

---

<sup>①</sup> 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本书有收录。

坚实的文献基础。

如果我们了解了古书都有一个长期流传、演变的过程,如果我们通过二重证据法能够“穷其流变”,那么,后人的删节和篡改也有真实的史料价值。诚如陈寅恪所言:“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断断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sup>①</sup>或许可作说明的是,古书的形成与流变,非一人一时之产物,但陈先生所言“伪史料”与“真史料”的关系,的确是处理古书失真、变形的一条重要原则。

2012年7月24日

---

<sup>①</sup> 陈寅恪:《〈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一》,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47年版。



# — 目录 —

## 理论纵横

|                                  |         |     |
|----------------------------------|---------|-----|
| 1. 辨别伪书及考证年代的方法 .....            | 梁启超     | 3   |
| 2. 《古书通例》节选 .....                | 余嘉锡     | 17  |
| 3. 《伪书通考》“总论” .....              | 张心澂     | 29  |
| 4. 对古书的反思 .....                  | 李学勤     | 40  |
| 5. 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 .....           | 李 零     | 44  |
| 6. 古籍真伪考辨的过去与未来 .....            | 郑良树     | 78  |
| 7. 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 .....             | 廖名春     | 91  |
| 8. 以战国竹书重读《古书通例》 .....           | (美) 顾史考 | 108 |
| 9. 新出简帛与学术史 .....                | 李学勤     | 127 |
| 10. 从简帛发现看古书的体例和分类 .....         | 李 零     | 136 |
| 11. 三种不同含义的“书” .....             | 李 零     | 148 |
| 12. 古书成书情况与古史史料学问题 .....         | 谢维扬     | 158 |
| 13. 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        | 裘锡圭     | 165 |
| 14. 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 .....              | 杨春梅     | 176 |
| 15. 从《清华简(壹)》看古书成书和流传的一些问题 ..... | 谢维扬     | 181 |

|                                  |     |     |
|----------------------------------|-----|-----|
| 16. 出土材料所见先秦古书的载体以及构成和传布方式 ..... | 冯胜君 | 190 |
|----------------------------------|-----|-----|

## 个案研究

|                                                  |     |     |
|--------------------------------------------------|-----|-----|
| 1. 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 .....                           | 李学勤 | 215 |
| 2. 论魏晋时期古文《尚书》的传流 .....                          | 李学勤 | 221 |
| 3. 从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论“晚书”的真伪 .....                     | 廖名春 | 231 |
| 4. 《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 .....                             | 齐思和 | 242 |
| 5. 《孙子兵法》时代特征考辨 .....                            | 蓝永蔚 | 255 |
| 6. 从《文选注》看《孙子》成书的渊源 .....                        | 黄朴民 | 284 |
| 7. 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 .....                            | 梁启超 | 290 |
| 8. 梁任公提诉《老子》时代一案判决书 .....                        | 张 煦 | 292 |
| 9. 从郭店楚简《老子》看老子其人其书 .....                        | 郭 沂 | 299 |
| 10. 关于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的结构与性质<br>——兼论其与通行本《老子》的关系 ..... | 王 博 | 312 |
| 11. 《论语》结集脞说 .....                               | 朱维铮 | 325 |
| 12. 定县竹简《论语》与《论语》的成书问题 .....                     | 梁 涛 | 342 |